

連載

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(4)

劉道玉

五、《三八行》的風波

一九四八年下半年，我因為襄陽聯中停辦而休學在家。我不怕吃苦，也不厭惡勞動，但我更熱愛讀書。在輟學居家的那段時間，我感到惆悵。像是被關在籠中的小鳥，渴望重新歸到能夠自由翱翔的天地裡去。

這一天終於來到了。

一九四九年春，新成立的棗陽縣人民政府，爲了發展人民文化教育事業，及時地恢復了棗陽縣中學。聽到這個消息我十分高興，我立刻趕去報名，憑著襄陽聯中的學生證和蔡陽人民政府的證明，我以同等學力的身份插入初二學習。

從襄陽縣二中到襄陽聯中，我都是用的二哥劉道啓的名字。那段時間，我心裡不踏實，總有一種負疚感，同時，也擔心哪一天露了馬腳而招致麻煩。我總想找一個機會，把學籍上的名字改正過來，結束冒名頂替的身份。

於是，我利用轉入棗陽縣中學的機會，決定把名字更正過來。我向校方說明了實情，提出了更名的申請報告，提供了鄉人民政府關於我的身份證明。經過校方的審查，認爲我沒有政治歷史問題，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，因此准許在學籍上更正爲我自己的名字。

新恢復的棗陽縣中學位於城關鎮的北關外，它的左翼連接的是一條叫做順城灣的商業小街，居民大多是回民。這條街的背後是一條小河，平時只見

沙石而看不到水，在多雨的夏季，也會呈現出河水奔流的景象，時有捕魚的泛舟出沒。在星期天，我們三五成群來到河邊洗衣服，下河玩水，有時也學畫一些素描，這算是那時僅有的一點娛樂活動了。

在解放初期，學校的社會活動很多，教學計畫往往因為突如其來的政治任務而受到衝擊。例如，有時要調遣教師和學生下鄉宣傳土地改革、清匪反霸等活動，有時要參加公審反革命分子的大會，甚至要派我們到掃盲識字班當小老師。那時，我們年少幼稚，雖然對這些活動的意義並沒有深刻的了解，但憑著一股子革命熱情，我們也都積極地參加了。這些活動雖然耽誤了不少的功課，但我們接觸到了社會，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。

棗陽縣中學恢復不久，學校立即著手建立共產黨和青年團的基層組織，這些工作都是在縣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。那時的團組織叫做新民主主義青年團，是由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得名的。

我記得大約在四月中旬，舉辦了一期入團積

極分子學習班，我和絕大多數的同學都參加了。學校決定在「五四」青年節那一天正式成立團支部，並批准接受第一批青年團員。頭一天，在學校的布告欄內，用大紅貼出了喜報，公布了第一批吸收入團同學的名字，學校向他們表示了祝賀。但是其中沒有我的名字，我一方面為那些入團的同學感到高興，真誠地向他們表示了祝賀；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很難過，這對於倔強和凡事都要爭第一的我來說，畢竟是一次沉重的打擊。

又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對於未能入團這件事一直不能釋懷，總覺得不公平。論學習我是班上撥尖的，論社會工作我也不比他人差。對於不批准我入團，我想了很久，但怎麼也想不通。於是，我決定向負責青年團工作的王老師問個究竟。我問道：「王老師，我離團員的要求還有哪些差距，今後應朝什麼方向努力？」她答道：「你學習成績優秀，要求上進，工作積極，這是你的優點。但是你的缺點是個性太強、很自負、愛表現。只要你改正了這些缺點，團的大門是隨時向你敞開的。」聽了王老

師對我的評價以後，我心裡很不是滋味，對於她指出我的那些缺點並不以為然。我以辯解的口吻問道：「王老師，對於你指出的缺點我想不通，希望你給我解釋一下。它們為什麼是缺點呢？它們的危害性又是什麼呢？」王老師並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，她只是說：「你想不通，那麼繼續想吧！」

自那以後，我就背上了上述這些缺點的思想包袱，而且在從初中到高中的每個學期的思想鑒定表上，都要填上這幾條缺點。既然我從老師那裡得不到答案，於是我就冥想苦想，我想呀，想呀，終於還是沒有想通。我反問自己：「如果個性強是缺點，那麼個性不強或沒有個性不就成了優點了嗎？如果自負是缺點，那麼自卑或自責不就成了優點了嗎？同樣地，愛表現如果是缺點，那麼什麼話也不說，什麼事也不做的無所作為不就成了優點了嗎？」越是我這樣的正反兩方面對比，我越是想不通，並暗下决心：我希望加入青年團，但我不能為入團而承認自己不認為是缺點的東西。也不應當違心地改變自我。

學校青年團成立後，為了宣傳青年團的知識，加強對廣大青年的教育，開始舉辦名為「青年團」的牆報，每半個月一期。這件事既刺激了我們又啓發了我們，青年團員的確起了帶頭作用，面對這種狀況，我該怎麼辦呢？在一種不服輸的思想支配下，我心想：我何不也發起創辦一個牆報呢？這樣既可以展現我們的才華，並且還可以證明我們不比那些團員差，甚至比他們還要做得好一些。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同班同學姜少卿和劉漢民，他倆也未被批准入團。心裡也有不服氣的思想，所以我們一拍即合。

要辦一個牆報，需要給它起個名稱，選定一個刊頭。姜少卿說：「刊名就叫『三人行』，表明是我們三人發起辦的，同時又蘊育了孔子的思想。」劉漢民建議道：「刊頭就用『工農兵』的宣傳畫，這也包含了三個人的意思。」我們同意了這些方案，並根據我們各自的長處作了分工；我負責寫稿和組稿，劉漢民負責畫刊和漫畫，姜少卿負責抄寫。經過秘密而又緊張的策劃，我們的《三人行》第一期

牆報，以圖文並茂的形式，與全校的同學們見面了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《三人行》牆報出刊以後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，使得《青年團》有些黯然失色。同學們普遍為我們叫好，引來了不少同學投稿，有詩歌、漫畫和學習經驗介紹。我們還受到了部分老師的稱讚。說我們有才華，他們也給我們提出了指導意見。可是，校方的反應卻是出奇的冷淡，似乎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，我們預感到可能會招惹麻煩。

同樣地不出所料，五六天以後，校長、團總支書記和班主任一起找我們三個人談話，氣氛嚴肅而緊張。校長首先指出：「你們三刊《三人行》是什麼意思？問題性質很嚴重，這是一種思想新動向，是不講情緒的流露，是另搞一套，是與《青年團》對著幹，必須立即停辦！」我辯解道：「我們牆報的內容並沒有問題，我們只是通過文章、漫畫來宣傳學習，介紹時事政策，這對鍛鍊我們的能力也有好處。」團總支書記說：「那也不行，你們要支持辦好《青年團》，你們也可以向它投稿嘛！」我們

還能說什麼呢，只能是沉默不語，而僅僅只辦了一期的《三人行》也從此沉默了。

我們慶幸的是，學校僅僅給我們定性為「思想新動向」，而沒有上綱到「階級鬥爭新動向」。如果這事發生在一九五七年或一九六六年，我們不是被打成右派，便是被定為「三家村」黑幫而受到批判了。

在棗陽縣中學習期間，是我的個性全面形成的重要時期，我要認識我自己、保持我自己。當然，為此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，至少在以後多次發展青年團員時，都與我無緣。

六、「假文憑」進高中

我在棗陽縣中是春季始業的，初中畢業時間是一九五〇年冬，但那時的高中都是秋季始業的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我要考高中的話，要麼初中畢業後在家呆一個學期，於一九五一年秋報考，這樣我就要吃一個學期的虧；要麼我就提前一個學期，於一九五〇年秋報考，但那時沒有提前畢業報考的規

定，真是有點為難。

按照我的性格，我是希望提前跳考的，樂於做超前的嘗試，更何況我的啓蒙教育晚了一些，一心想要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。但是，跳考的困難還不是少學了一個學期的初中課程，而真正的攔路虎是合格的初中畢業文憑，沒有它根本不可能越過報名關。

在這一籌莫展之時，一個意外的消息使得我跳考高中的希望有了可能。聽說，高我一屆的一個棗陽老鄉，他也是由初三上學期結業後考上襄陽高中的。於是，我直接找到他，說明我想提前考高中的意圖，詢問他如何解決初中畢業文憑的問題。他很乾脆地說：「這事好辦，你的畢業文憑就包在我身上了。」他向我索取了一張相片，大約十來天以後，他交給我一張嶄新的、正規的初中畢業文憑，署名單位是河南省南陽中學，在相片上蓋了銅印，也有校長的簽章，可惜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了。事後很久，那位同鄉告訴了我個中的秘密：原來南陽解放時，南陽中學的校長和部分教師隨國民黨逃竄

了，管教務的是一位棗陽籍先生，他趁機把石印的空白畢業文憑、學校鋼印和校長的私章都帶回了家，我們的初中畢業文憑就是由這位先生出具的。從性質上說，無疑這是一次違法的作弊行爲，雖然它滿足了我跳考的欲望，但每當我回憶這樁事時，內心總有一種羞愧之感。並且，在以後入團和入黨時，我都向組織上老實作了交代。

我憑著這張偽造的假文憑到襄陽高中報了名。參加了規定的入學考試。襄陽高中的前身是湖北省第五高中，是湖北省重點高中之一，面向鄂西北十幾個縣招生，所以競爭是激烈的。我是在沒有充份準備的情況下參考的，再加上初三下學期的課程完全沒有學習，所以考試的成績不理想，雖然被錄取了，但排名僅位於中等偏上一點。儘管如此，我心裡還是十分高興的，這不僅使我實現了學業上的「三級跳高」，而且是我以後發展的至關重要的一步。

襄陽高中位於古襄陽城的東北角的長門內，出了長門就是去樊城的渡口碼頭，是我回家和返校的

必經之處。記得我第一次乘木划子過江時，它時而傾斜欲翻，時而好似浪過飛舟，真有點膽顫心驚。後來過的次數多了，慢慢地也就習以為常了。校園離街區還有一段較長的距離，背靠城牆，三面均被大片的菜園子包圍著，頗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，是讀書的理想地方。每當晨曦微啟或夕陽西下的時候，我總是喜歡獨自來到城牆上，或背誦課文，或默記俄文生字，使我感到微風拂人面、知識潤心田的無窮樂趣。

襄陽高中果然名不虛傳，是我自受啟蒙教育以來，所遇到的最好的一所中學。任課教師大多是名牌大學的畢業生，如俄文教師王文軒是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；生物老師王壽剛是北京大學畢業的，是「五四」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；物理課老師劉叔遠和政治課教師兼班主任鄧菊生是清華大學畢業的；語文老師羅大同和數學老師宋啓善是中華大學畢業的。我很慶幸能遇上這一批名師。在他們「潤物細無聲」地教誨與管理之下，我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素質、文化基礎，這是我日後繼續學習和提高所

必不可少的。

一九五一年冬天，一個意想不到的打擊降落到我們家——辛勞一生的父親突然去世，一個風雪交加的冬日，堂兄頂風踏雪步行了一百二十里到學校把這不幸的噩耗告訴我。聽到這不幸的消息，我大哭了起來，老師和同學都安慰我，才使我情緒慢慢地安定了下來。是夜，堂兄與我合鋪將就了一晚，次日一大早，我們就上路趕回家裡奔喪。

家裡一片淒慘的景象，母親臥床不起，已幾日粒米未進，親戚們都在張羅安葬事宜。父親的遺體尚未入殮，我逕自來到父親的遺體前，撲通一下子跪下，放聲大哭起來。二哥見我哭得太傷心，他勸道：「不能再哭了，要不然媽會更傷心。」於是，我來到母親床前，她又哭了一陣子，告訴我：「你爹死前啥徵兆也沒有，先一天晚上睡覺時還好好的，第二天早上叫他答應，一瞧他已咽氣了。這是修行啊，他走得安詳，我也盼這一天。」父親的死因雖沒有結論，但估計是心腦血管疾病突發而猝死。父親終年五十九歲。

安葬父親後，我立即趕回學校。我為父親的去世而悲傷，但我要化悲痛為力量，努力學習成才，以報答在九泉之下的父親。

一九五二年夏，襄陽高中經歷了一次學校的合併與搬遷。不知是出於什麼原因，政府決定把私立樊城峴北中學和光化縣的光化中學合併到襄陽高中，改名為襄陽中學，校址由東北角的長門遷至西北角的柴場，它的右側是一座很別緻的歐式建築的天主教堂。校門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築，進門後要跨越一座狀元橋，再往後是一座雄偉的大成寶殿，周圍生長著參天的古松柏。雖然那時我不知道這裡是作何用處，但它有濃厚的文化氣氛，作為辦學場所是再理想不過的了。

三校合併後，由於各校原有的數學水平有差異，學生構成也不同，因此同學們之間也存有一些小小的隔膜。原襄陽高中的同學，絕大部分來自各縣的農村，家境貧寒，學習十分刻苦，學習成績較好，他們往往被城市的學生瞧不起，被稱為「土包子」或「醜小鴨」。而來自另外兩所學校的同學，

很大一部分來自城市，經濟條件較好，平時愛吃零食，活潑愛玩，我們稱他們為「洋白菜」或「驕傲的鵝」。為了顯示我們的實力，維護我們的自尊心，我們一批農村的學生，組織了一個名叫「電甩」的籃球隊，專門找城市裡的學生賽球，我們憑著體力和毅力，做到每賽必勝。關鍵就在這個「甩」字上，由於我們農村學生身體壯、力氣大，那些城市裡的同學，只要一接觸到我們的身體，就像碰到電刷子一樣被打倒在地。於是，我們就完全控制了球場，這怎麼不贏球呢！其實，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對立，這些活動只不過是我們這些不甘寂寞的年輕人的一種取樂而已。但是，不管如何，通過這些活動，我們這些灰不溜秋的「醜小鴨」也揚眉吐氣了。

高一下學期臨近期末，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，我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。這倒不是因為我改正了個性太強和愛表現的「缺點」，而是團組織實在列舉不出我的過失。況且，這時團員在適齡青年中幾乎達到普及的程度，已不再是青年中的

「稀有元素」了。

一九五二年初夏，另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：我的母親不幸去世了。母親是信奉佛教的，她認定：生死在天命，不能與父親同年生，但要隨父親同庚去。母親比父親小一歲，所以她選定在父親去世的第二年，了卻了她的「心願」。

母親是自縊身亡的，這本來是不該發生的。導致這一悲劇的直接原因和責任者是二嫂，她一貫對母親不好；再加上母親已下定了跟隨父親走的決心，所以才選擇了自縊的辦法結束自己的生命。惡果已經釀成了面對著這不幸的人禍，我能說什麼呢？我既不能喚回母親的生命，又不可能要二嫂抵命，使這個悲慘的家庭再增加新的不幸。面對母親僵硬的屍體，我悲愴地哭喊：「娘啊，兒回來晚了，如果我在家陪你說說話，讓你傾訴出你全部的憂傷和委屈，也許你不會走上這條路。我知道，你對我抱著極大的希望，現在我離上大學只有一步之遙了，你為何不等到這一天呢？」

我自幼受父母的恩惠太多了，他們為我吃了數

不清的苦楚，但是我未能對他們盡到贍養之責，未盡孝道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。

高中三年的學習生活緊張而充實，很快我們就要面臨升大學的高考了，這是人生諸多掙扎中最重要的一搏了。

像是命運故意與我們過不去，也許是老天爺要考驗我們的意志，我們高考的一九五三年夏天是一個罕見的酷暑。在備考期間，熱浪滾滾，既沒有任何降溫設備，也沒有冷飲止渴，我們男生幾乎個個都是赤膊上陣。古人曰：「十年磨一刻，霜刃未嘗試。」現在，經過十年工夫精心磨製的劍刃，終於要試試它的鋒芒了。有趣的是，是正式高考的那三天。當地卻忽然喜降大雨，既驅走了熱浪，又消散了我們心頭的愁雲。

我和絕大多數的同學都做了最充分的發揮，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，實現了我們人生的又一次跳躍！

我家鄉的父老們，也為祖祖輩輩出現我這第一個大學生而笑逐顏開。

（待續）